

上主新娘的婚典飾妝

任如海

(編者按：山西省神哲學院於二零零一年初進行遷院工程期間，主事人加入了許多慶典活動。對於該等慶典是否必要，以及其引申出來的問題，任如海神父特意寫成本文，與讀者分享其反省。)

緒言

新士林哲學大師羅納根神父 (Bernard J. F. Lonergan, S.J.) 將教會作爲一個「集合性的主體」 (Collective Subject)。欲了解何爲「集合性的主

體」，就要由「人的主體性」 (Human Subjectivity) 說起，羅納根認爲：人有其位格是因作爲整個的人不斷在四個不同的意識層面上活動，尋求自我意義並向外表達這自我的意義。主體經由第一意識層面即「經驗的主體」 (Experiential Subject) 再進入第二意識層面「懂悟的主體」 (Intelligent Subject)，經「推理的主體」 (Rational Subject) 最後到達第四意識層面「負責的主體」 (Responsible Subject)，這樣人有了整體性的答案，並根據這個答案做出決定，負起責來實踐到行動上，從而真正意義上的「我

的主體」出現了。而集合性的主體也一樣是在過程中逐漸形成與成長。

作為教會成員之一，我努力從自我方面以一個「負責的主體」出現，並促成團體，切盼團體達致「集合性主體」的共負責任。以此來反思當代基督教倫理問題，並指出倫理學不是從概念到概念那樣的簡單，而恰是對生活最深層思想態度的客觀表達。我認為在慶典問題上不僅僅體現為「我做什麼樣的人」，更也體現為「我們選擇什麼樣的教會發展理想」的問題。

以疑問加反思的方式對問題的實質進行研究，而且以一個「默存在心、反覆思索」的方法在問題之前、之後進行了理論—實踐—反省—結論的過程，並進一步從哲學與神學的角度對慶典背後的教會問題加以探究，指出其根本在於「家園的失落」，並對如之現實化處境予以深刻追問。

綠色運動、可持續發展本來是生態與自然的新型概念，站在修院自身的生存、繁榮、穩定、與

開拓前進的角度上，我覺得我們應思考修院作為福音價值承擔見證的載體自己努力該做的事，給我們山西乃至中國基督教的神學思考提出一個更為廣闊的想像空間。

修院即將進行慶典，將如何搞好這一次活動呢？中國俗語所謂：「人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後半句話便值得我們去捫心自問。我們進行活動是為誰而做？聖經中人們很容易用新娘和新郎的圖象來比喻教會與耶穌基督之間的奧秘關係，教會新娘的存在是為障顯基督新郎臉上所具有的榮耀。

慶典三部曲之一：為誰而容？

在實際慶典的操作中我們能否達到慶祝行為模式的理想呢？由於現實價值的特殊性（利益驅動），我們定不能夠達到，毫不諱言地這樣講。我不知道又懶又饒的女人，又沒有花枝與月貌何以僅憑金銀首飾就要表達內在的一切。豈不現出其虛偽

造作之感？而要知道：賢淑女子的美麗是因一種內在美的天賦氣質。

今天修院慶典的實質在於教會辦事是爲主？還是爲人？也即是討主的喜悅呢？還是討人的喜悅呢？爲主、爲人二者是不能兼容共享的。要麼討主的喜悅，要麼是獲致人的歡欣。如果選擇討人的歡欣，那我們將永遠也不可能達到這一點，同時我們也將失去真實的自我。汾陽教會一九九六年八月八日的七十周年之慶就是一個甚爲生動的失敗教訓。記住：我們決不可能贏得所有人。

因此，德國新教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激動地呼籲說：除上帝之外，在人世間絕無神聖。而事實上人們很容易在神聖的面紗或借口下幹出反神聖的舉措，從而樹立別的神聖予以頂禮膜拜。當然我們在此也絕非主張費耶阿本德的什麼都行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否定任何標準的可能性。

基督教倫理學要求目的、對象、環境三維合一的倫理思想觀。僅有好的動機（即康德的唯動機

論）也是不夠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曾經對之做了深刻的批判。我們做事不僅應有好的目的，也應注重方法並適於恰當的環境性因素，因而我們有必要對本地化予以歷時性與共時性的探討。

也許有人會提出：現在已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去做的問題，從而走入「處境倫理學」的窠臼或假象中。要知道：不是抽象的其本身便欲否定事情的客觀性與價值基礎背後的人性，以及福音價值實現的可能性，這只能掩飾自己對那些無知小輩的嘲笑與愚弄。

要麼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盲目性；要麼是白貓、黑貓只要有利就圖的「功利主義」；要麼是我定了就定了的官僚主義的獨斷專行。誠然，基督價值觀不是盲目性的，而是有其目標方向，趨向天國的；它也不是功利式的，而是克服功利的天國共同理想；更不是計較真理掌握在少數派手中抑或多數人手中，而是存留在那些心靈純樸的人心中，因

爲心地純樸，聖神自然臨現。

慶典三部曲之二：背水一戰

修院做出的是一個執拗而又愚蠢的決定。在較早前流傳的「爲誰而容？」一文中作者對該次慶典的挖掘我想還具有更多的未盡之文。

時代在進步，而作者本人所用的一句俗語卻是「女爲悅己者容」，這句話本來是封建社會的思想，爲當代人已經落後。今天社會人士早已除卻了過去封建的價值追求，而是轉化爲「人爲追求自己之美」而容。在此作者沒能在爲主、爲人的兩極中看到二者並非此即彼的對立性。而從概念本身還存在著第三者的可能性，即爲己性。這一點卻正是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也就是說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夠找到慶典之舉的問題實質。

既非爲主，也非爲人。事實上爲主與爲人之說從當事人角度而言實屬多餘。其一、爲主，主並

不需要我們光榮祂，因爲福音價值大家深深知道，我們已經能倒背如流。但我們不欲、或說是沒有勇氣從自身開刀。讓那些聖人們去做聖人的事吧！我們寧願做一名凡夫俗子，這樣更好；其二、爲人，事實上也是沒有必要的。神父會反對嗎？不會的！他們既回到了自己的娘家，那有兒子嫌母親不造作一點兒的呢？借錢給修院的人會反對嗎？不會的！因爲他們考慮的是把錢如數收回；出錢資助的教友會反對嗎？不會的！他們在出錢的時候心地裡根本没有僅僅衝著今天的一頓飯；債主們會反對嗎？也不會的！因爲他們所需要的是收回所欠；外地教友會反對嗎？不會的！他們在那一天考慮的是如何早一點平安的回家與親人團聚；本地教友有意見嗎？更不會的！因爲他們早已厭倦那些奢侈而煩人的慶典。真正意義上擔憂人們會反對那是根本無任何必要的多情之憂。

修道院衆根本意義上不同於堂區，即便堂區慶賀也是本地信友從自己生活中血汗所得去做慶

祝，而修院本為清靜之地在沒有任何一丁點兒收入，至今仍需要靠修士學費及教友的募捐才可以維持日常運作的團體，卻還在無謂的裝腔作勢，不是顯得有些造作嗎？負債累累的情況下，我們在此卻以寡婦獻儀與下崗職工的生活節餘花天酒地，有何意義？

如果我們直到今天甚至連修道院這樣的清靜之地還在一味地追求世俗榮華，我們的天主教會在此現代世界講話還有沒有力量？大事慶賀留給人的不僅是奢侈與浪費，更多的是修道院內在價值的一種遺失，因為我們用行動向這個世界宣告福音理想的破產。

從企業文化角度來分析：今天佔七十畝地的山西總修院，固定一千萬資產和那可能的十萬禮錢不能相提並論，而修道院與福音價值的無形資產更不是金錢能夠衡量。「海」宴不僅浪費也將使人員管理更為困難，不周到的環節更為明顯；收禮將會把人分為三、六、九等，也會使那些奉獻者們更為

難堪，債主因之而蜂湧而來，修院未來的名譽受損，斷卻教友對修院的資助。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讓·瑪麗·鮑斯克（Jean-M. Boss）所反省的亞洲天主教修院與祈禱中心的缺乏見証性在這「孤注一擲、背水一戰」的行為中我們可窺一斑。

慶典三部曲之三：誰是漁翁？

山西修院今天花錢消災，究竟是為悅誰之心？！如此親者痛，而仇者快的行動中，究竟誰是漁翁？！

你看那人人皆在忙亂不止的，猶如再次回到了大躍進的時代。學生不學習，老師不上課，放下了祈禱，停頓了學業。整個世界為之也不再寧靜。問題並非從今天才開始，其追求的價值早已做了轉移。修院本來首要是為修習寧靜；其二為學習必要知識以內化成行動；而我們早已將力量放到工程，今天卻又非慶典莫屬。

有一位哲學家說人就是在向死而生，而我們

若不如之好象就無顏以對天下人。面臨福音價值的遺失而不覺心痛；面對修院內在底蘊的喪失而坦然處之。這就是最好的選擇，別無其它。

我不知道：一個方法既然已經是「獨一無二」，沒有更多的選擇，何以能成爲最好？而向死而生的行動中我們又能得到些什麼呢？事實上，我們明知簡約的方式是生命中應予以追求的，而我們卻執著地選擇他途。

是不是因爲有人反對浪費與奢侈，我們就反其道而行之呢？這不正如文革期間那些反動分子所言的：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而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呢？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我看實在沒有必要這樣做來顯示自己的存在與特殊性。因爲我們並不是爲「我們」或者是爲什麼「主義」而存在，而是做福音價值的僕人啊！

修院慶典的哲學反思

山西教會本地化基督教倫理學的完成不是由

國外學者（諸如歐、美學者），亦非由港、台學者，而就是本地人自己。因而，我們山西修院的本地神長、修士很有必要來反思我們種種的切身行爲的倫理性。

慶典是否只是迎合了極少數人呢？一位本地的資深教友說：那些對修院從簡辦事反應極大的那些人只是極少數。而且，爲那些真正關心並做出奉獻的教友來說，他們並不會這樣苛刻，而正是那些沒有做奉獻，還要長要短的人才會說。由此，我們可以再次地對慶典之舉究竟爲了什麼來做深層的思考。

透過本次的實際行動，我們就可以看出：倫理學絕對不是從概念到概念那樣的「坐而論道」，抑或僅僅「紙上談兵」，而就是我們對自己所選擇生活態度的現實表達；是我們宣布我們對所在的這個世界、這個社會、這個身處環境的最爲基本的生活態度。

透過慶典與修建，我們可發現倫理學也絕非

個人就可以完成，而涉及到團體性的建構，也就是現代神學與哲學的實踐性（政治神學、生態神學、自然神學、解放神學、婦女神學、希望神學等皆要求實踐，這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過去的哲學家僅在於認識世界，而現代哲學尚需要改造世界）、公衆性（不是個人，而是團體的合作、對話，正如後現代主義者利奧塔德 Lyotard 所言的意見統一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意見，而是權力的壓抑）、批判性（現代年輕一代體現出的不是傳統或權力所說的就接受，而是仍保留自己的意見）。現代人運用「獨善其身」、「陶淵明」式的逃避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它絕不作爲選擇的最佳方式，而人們在面對問題時必須以成人的方式來處理生活與現實的挑戰。

我們必須走出「人類中心困境」。當個人從自我中走出而走向家庭，進一步走向社團，走向社會、國家、世界，最後走向神，到那時人就超越了自己，正如新儒家杜維明極力主張的走向「天人合一」。

在此我們很有必要來思考我們修院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最初人們所建議的不收禮、盒飯等一系列措施就是一項長期的可持續發展，人們不是要標新立異之舉，而實是要找尋一個適合於山西教會本地發展的新的思路。在今天，我們年輕一代很有必要對自己所處環境，所面對文化進行深刻反思，從而找尋當時、當地的可行之舉，對此這一代人皆不可以辭其咎。此時需要去考慮招生的問題，修生的健康發展問題、償還債務問題以及天主教在山西社會的形象問題。

綠色發展不是激進的紅色也非保守的藍色，也不是紅與藍的折衷與調和，而是另一種異於前二者的綠色。由此，人們去思考適於自我內在生命發展邏輯的可持續未來。

回歸精神的家園

面對山西修院慶典問題進行深刻思考以後，許多朋友與我一道閱讀並分享了慶典三部曲：爲誰

而容、背水一戰、誰是漁翁。在大家閱讀並分享的同時，我立時意識到有一個更爲重要的思想需要表達，也就是今天所談的回歸家園。我們更多的去面對生活、面對選擇的無奈而慨嘆，但卻沒有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做出思考。而在三部曲寫作過程中我體驗到的恰是家園的喪失。

很有必要坐到桌前並靜下心來對我們自己的最爲根本性問題進行思考了，在日常生活中處理問題的選擇上是否我們出了什麼樣的麻煩呢？更多的時候我們體現出的是一種文化的麻木，也就是對自己本地的文化缺乏認同，而體現爲一種生活與選擇的隨波逐流、人云亦云。那麼何謂自我？自我爲何的問題也許作爲修道院的我們這麼多年來就從未考慮過。在一些事情上我們所呈現的是要長要短，試與他人比高，然而是否行爲很有必要那就另當別論，而這一點正是我們自己問題的徵結所在。

人說：沒有危機意識，就沒有上進；而沒有自覺的反思意識，將沒有成功。在今天面對自我爲

何的疑問上我們既無危機更無反思，我們似乎是一個無知且光著屁股在大街上玩耍的兒童，那份旁若無人、任意所爲的樣子讓人不知其可。從企業角度而言講究一種理念，這種企業理念反映在企業文化於外在的形象表達上，透過外在形象人就可以對該企業有一深層的認知，從而該企業就生活在人們的心中，其無形的資產就確立起來了。當然，我們不是要將修院等同於企業一樣經營，而後進行包裝並予以出售，但我們從內在來找到真實的自我，我想爲現在的山西修院（或更好推廣爲山西教會）是很有現實意義的。

在教會體制上，我們學習了中國社會性的家長制、官僚制，本來是一個服務性的宗教團體，便漸漸成爲了一個具有等級的人事組織。在其中領導一個人說了算，而那些作爲屬下的沒有民主，因爲我們團體中拒絕民主；也沒有人權，因爲我們不要人權，只要上施下行的唯命是從；在對自身的價值性上，我們接受了許多的來自於西方的文化優越

感，而這正是舊約猶太人的自以為是的聖潔性，在其中有眾多的獨善其身，天主選民的高高在上，以及法利塞人的法律瑣碎；在行為模式上，我們沒有一貫的為人處事品質，而是時時事事去學習抑或模仿別人，前天我們和社會比，昨天我們和企業比，今天我們又和那些大張旗鼓的家庭比，總而言之，我們中國教會的這四百年來一直就沒有走出屬於我們最爲本真自我所應走的路。

今日的中國天主教會如果在方方面面還認識不到自身文化價值的遺失，才是真正的可悲。那不覺的社會塑造，在無意識中的角色移位，面對電視、廣告上的自居認同，這一切一切皆會使我們更找不到回家的路。

教會文化價值上的分格化是由來已久的沉痾。我們在追求基督福音價值的同時早已呈現出對基督價值的輕視與改造。諸如，在愛的問題上，人們面對修士是一種指斥，而面對神職人員卻是更多地給予歌頌，面對教會同工體現的是一種習慣性的

點頭之禮，而面對那些社會人士（狐朋之輩）表現出的更多的是殷切倍至、勝若父親。這樣的一種分而對之的態度並不是個別的案例，而正呈現一種普遍情形。爲那些身在高處（身處高位）的人也許正如大眾所言的是一種「高處不勝寒」。「親者痛而仇者快」不免就成爲了自自然然的事，見怪不怪了。

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曾經在其大作《存在與時間》一書中對這種狀態做了較爲深刻的探討，他指出更多的時候一些人會體現爲一種「常人」狀態，也稱作是「沉淪」，這時人所呈現的是「人云亦云」，別人如何自己也就趨之若鶩了。而人一旦沉淪就變得沒有生活的激情與生活的展開，更多的是生活的封閉與生活品質的下降，這樣狀態下的人實爲可憐之輩。被動地爲社會所塑造也就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在這樣的不幸境地，不也就成爲了漂泊不定嗎？

成爲精神上的游子也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沒有了家園。人回歸自己精神的家園看來甚有必

要。沒有了家園的人正是在此的意義上，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自我。

反省諸己，作為四百年的中國教會我們不能說她失去了自我，而是應說她一直就沒有走出屬於自己的路。我們這一代人甚至為後七代的人所要面臨的恰是要走出屬於中國教會自己的路，而這路不是西方化的照搬，也不是不作取捨的對社會的自居認同。路是自己走出來的，不是由別人給自己設定的。基督在世的時候沒有告訴人們未來天國界限，而只告訴了門徒要有充分的信德。而今天的普世天主教會也沒有在教會發展的問題上要求模式的統一性，而是號召全教會早日促成本地化的實現。教會就是在其「往普天下去」的福傳實踐中日勝一日地對自己真正的自我，對自己真正的使命得到明晰的辨識。

教會生存於這個世界不是靠答案，教會更不是靠答案來生存，而恰是靠信德臨在於世界。

梅瑟所面臨的以色列人正是一個沒有自己家

園的現實。而當代的中國教會需要從苟延殘喘的生命歲月中振作起來，好能夠走出沒有家園的被奴役處境。儘管在走向福地的路上沒有保障，但我們卻充分地擁有上主所賜的自由，我們需要找到真實的自我。這樣，我們就能夠體驗到做為天主子民的那份真實使命與作天主兒女的那份自由，因為此時的我們不再是為別人而活，也非為自己的臉面活著，而是為那會歷苦難與復活的主活著。

□